

浙江余姚田螺山新石器时代 遗址 2004 年发掘简报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余姚市文物保护管理所
河姆渡遗址博物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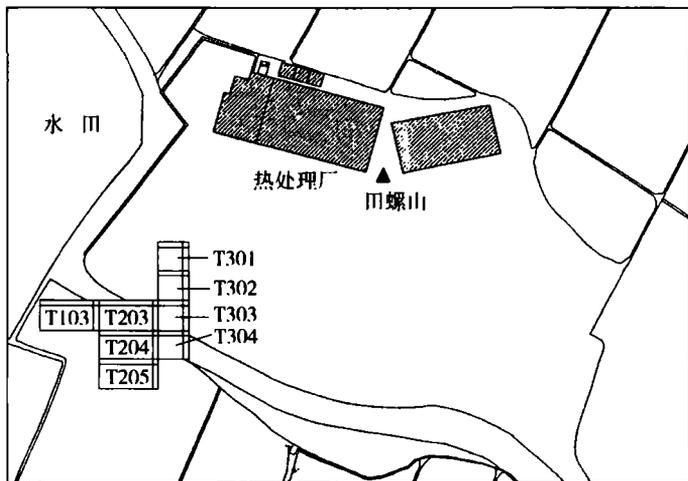
在中国众多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河姆渡遗址¹¹对诸多学科领域和研究方向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同时它在文化源头、稻作农业、干栏式木构建筑、聚落形态和环境变迁等方面却留下了亟待解答的疑问。浙江余姚田螺山遗址的发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新审视河姆渡文化的机遇。现将该遗址 2004 年的发掘情况简报如下。

一 地理位置与发掘概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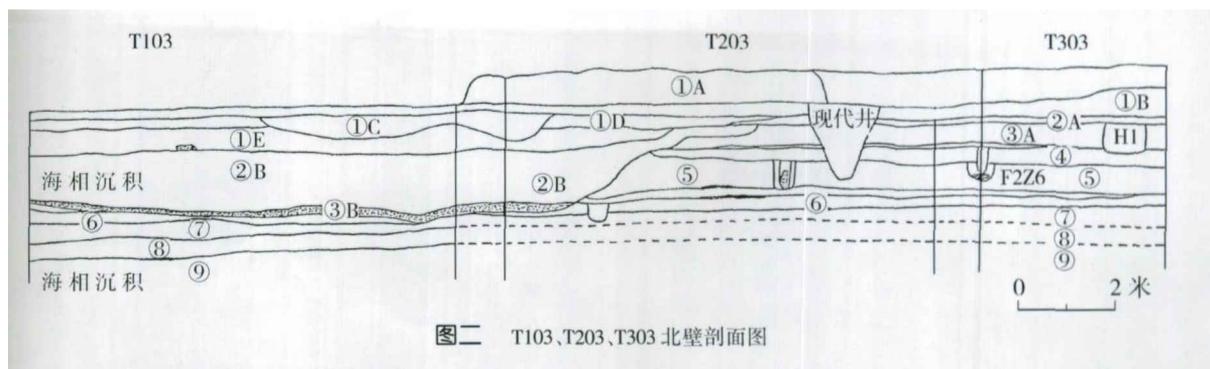
田螺山遗址位于浙江省余姚市三七市镇相岙村,地处姚江谷地北侧低丘环绕的小盆地中部,北面横亘四明山支脉翠屏山,东距海岸 30~40 公里,西南距河姆渡遗址约 7 公里。该遗址围绕一个名为田螺山的小山头分布,周围是大片低平湿软的稻田(海拔 2.3 米)。经钻探,

遗址的面积为 30000 多平方米,在地下 2~3 米深处埋藏着距今六七千年的一个完整古村落,其存在的时间跨度在 1500 年以上。

2001 年初,该遗址因当地一家工厂打井被发现。2003 年,国家文物局批准对该遗址进行考古发掘。2004 年 2 月 18 日,由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主持,并联合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河姆渡遗址博物馆正式开始发掘,按 5 米×10 米布置探方,发掘面积为 300 平方米(图一)。至 2004 年 7



图一 探方位置示意图



图二 T103、T203、T303 北壁剖面图

月初,发掘工作在普遍发掘到第⑥层下的重要建筑遗迹层面,并落实了临时性的保护措施之后暂告一个阶段。

二 地层堆积

发掘区位于整个遗址的西北部,田螺山的西南侧,此处也是遗址主体堆积所在。地层堆积由东北向西南平缓倾斜,最厚处约为 3.5 米,目前分为 8 层,其中第③~⑧层大致相当于河姆渡遗址的第②~④层。除 T103 已发掘到生土层(有线索显示,它可能还不是该遗址最终的

生土层)外,其他探方均暂停在第⑦层表面,下面还有平均厚约 0.8 米、内涵最丰富的第⑦、⑧两层堆积。现以 T103、T203、T303 北壁剖面为例介绍地层的堆积情况(图二)。

第①层:表土层,由现代建筑废弃物、灰色黏土、黄褐色粉沙土等组成,厚 0.3~1.6 米。

第②层:分 2 层。

第②A 层:青灰色土,略含沙和烧土颗粒,较硬实,仅分布于高处,直接叠压在晚期文化层上,厚 0~0.15 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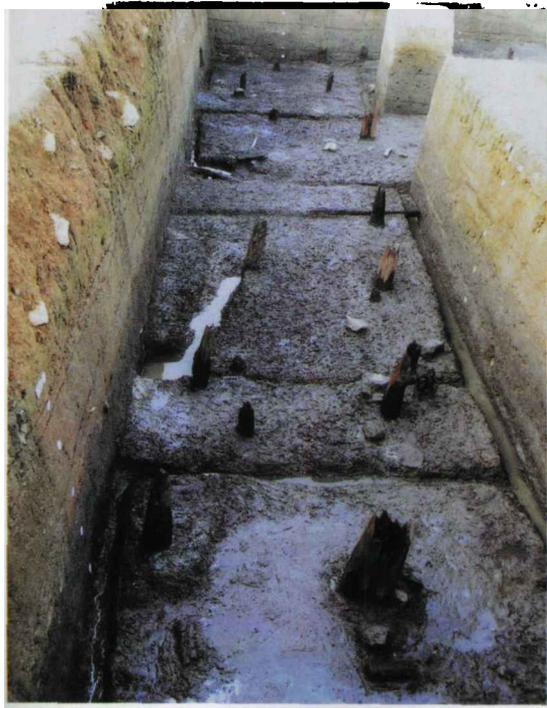
第②B 层:青灰色淤泥层,细腻,黏软,低处厚,直接叠压在晚期文化层上,厚 0~1.4 米。经取样分析,以海相沉积为主,与遗址的废弃有很大关系。包含物很少,偶见树枝条和原始瓷片。

第③层:分 2 层。

第③A 层:原生文化堆积,青灰褐色沙土,较干硬,分布于较高处,厚 0~0.5 米。包含较多的陶片、烧土块、石块以及少量的石器,它们一般与泥土胶结紧密,极少见动植物遗存。陶片中可辨器形有釜、鼎、灶、支脚、盆、豆、钵、罐、盃、异形鬲等。

第③B 层:在第②B 层下较深处,直接叠压在第⑤、⑥层上,厚 0~0.2 米。主要由大量的沙粒、小陶片、木炭、烧土块组成,还有少量的木块、树枝条,应是经过冲刷、搬运而来的次生堆积。从其中最晚的陶片和主要陶器器形看,与第③A 层的年代接近。

第④层:深青灰褐色土,含细沙,略黏软,被第③A 层叠压,厚 0~0.35 米。此层下开口较



图三 F3 (由北向南摄)



图四 F4



图五 Q1



图六 木桨(T103⑧:3)出土情况



图七 陶盃(T103⑧:25)出土情况



图八 第二期柱坑与灰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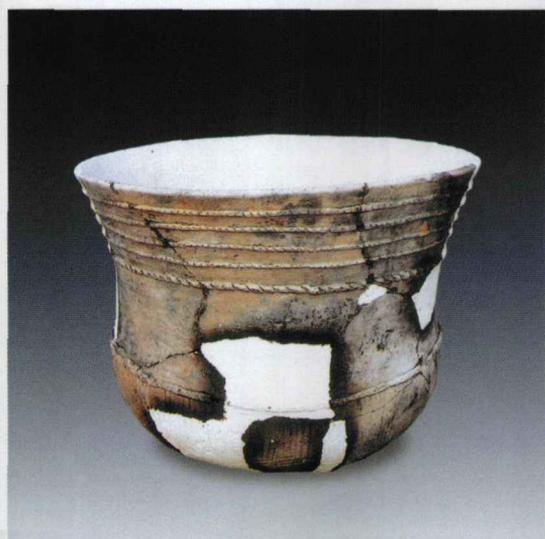
图九 F2Z1垫板



图一〇 陶罐 (M2:1)



图一一 陶敛口釜 (T103⑧: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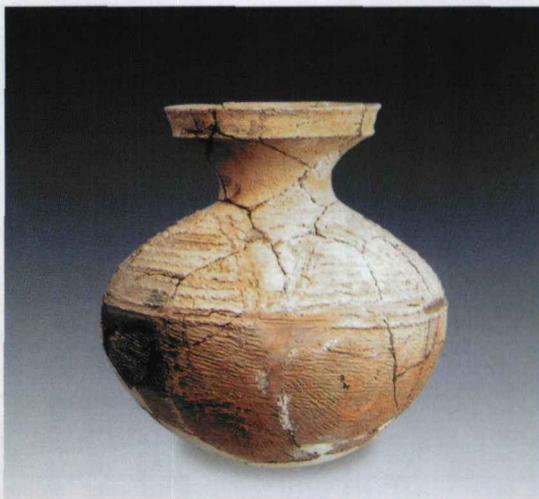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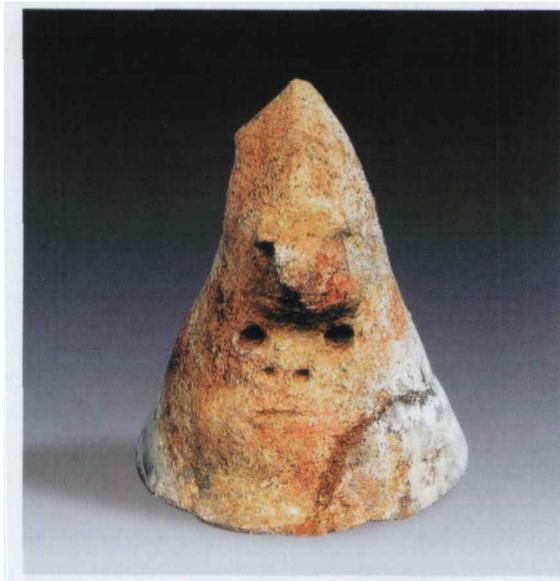
图一三 陶敞口釜 (H4:2)



图一二 陶敞口釜 (DK1⑤:1)

图一四 陶盘口釜 (M3:3)





图一五 陶支脚 (T303③A:1)



图一六 玉玦 (DG3③A:1)

多带垫板(木础)的柱坑类建筑遗迹和可能是食物储藏坑的灰坑。出土陶片中可辨器形有敞口釜、灶、甑、豆、罐、盆、钵、支脚等,还有少量鼎足。

第⑤层:青灰色土,沙性大,松软,夹杂略硬的青黄色土块和木炭颗粒,也有较多的陶片、骨头和木块等,厚0~0.6米。此层下露出一些木柱的尖部和几座二次葬的墓葬。出土陶片中较多的器形有敞口釜、敛口釜,直口釜较少,另有双耳罐、盆、盘、钵等。

第⑥层:深灰色土,松散,夹杂较多的木炭颗粒和黑色灰烬,与第⑤层不易区分,厚0~0.3米。除陶片外,还包含较多的木、骨类有机

质遗物。该层下部露出较多保存尚好且排列有一定规律的木柱,并在此层下的地面上多能找到柱坑的开口,表明其与遗址早期重要的木构建筑遗迹有关。从出土的陶片中可以看出以敛口釜、敞口釜为主,还有一些直口釜、单耳小口釜,另有盆、盘、钵、罐、支脚等。

第⑦层:褐灰色土,较湿软,厚0.2~0.5米。除包含较多大块陶片外,还夹杂肉眼可见的木块、木屑、树叶、菱角、橡子、酸枣、稻谷壳、炭化米粒、动物骨头等大量有机质遗物,以及肉眼难以辨认的碎骨、种子、孢粉等动植物遗存。在此层堆积表面保存着以成排方体木柱为特征的木构建筑遗迹。此层下的堆积除T103外,均未发掘。出土陶器中敛口有脊釜较多,另有敞口釜、盆、盘、钵、罐、豆、器座、支脚等。

第⑧层:深褐色土,湿软,夹杂少量纯净的青灰色淤泥,厚约0.4米。包含物与第⑦层相近,但保存状况较之更好。出土的陶器与第⑦层基本相同,但敛口有脊釜的比例较之更大。

第⑧层以下是细腻、纯净、黏软的青灰色



图一七 木浆 (T103⑧:4) 出土情况

淤泥,经取样分析,为全新世较早阶段的海相沉积,在遗址附近厚数米至 20 多米。在田螺山南侧较浅处打穿这层海相沉积的两个探孔底部,发现了一些木炭颗粒和可能是小陶片的遗物,这将在后续的发掘中设法加以证实。

上述第③~⑧层,根据土色、土质、叠压次序和出土器物的形制,可以分为早晚紧密衔接且文化内涵各具特色的三个阶段。

三 第一期遗存

1. 遗迹

由于第⑥层下的堆积尚未全部发掘,第一期遗存中的遗迹除了 3 处木构建筑单元的局部较清楚以外,其他尚不详。

F3 在 T301~T304 第⑥层下出土了排列整齐、加工规整、用材讲究的两排方体木柱,方向朝南且略偏西,横向间距约 2 米。西列由 5 根木柱组成,跨度约 10 米,每 2 根邻柱的间距约 2 米。最北一根木柱最粗,边长约 0.2 米,似为西北角的转角柱,其余木柱的边长约 0.1 米,往南似未到头。东列由 4 根木柱组成,南段已缺失 1 根,其各自的位置多与西列木柱相对。有些木柱露头于第⑤层下,并在第⑥层下可找到柱坑的开口,而且至少打破了第⑦、⑧层,坑口以上木柱长 0.3~0.7 米,坑下埋深和底部的处理方式尚不详。这两排木柱应是该遗址中保存良好的早期木构建筑遗迹的一个单元。另外,受发掘面积的限制,单元形态尚不完整,但整体形态很可能是南北向伸展、东西两个方向进出的长排形连体分间木构房屋,同时从木柱的分布趋势和遗址的空间布局分析,发掘区的东南方向应是这组建筑的主体所在,并在位置上可能靠近遗址的中心区域。这种形态的木构建筑遗迹在河姆渡遗址的同期遗存中尚不清楚,从第⑦层堆积的表面不适合人长期直接居住看,这类建筑也应是架空居住面的干栏式木构建筑(图三)。

F4 在 T204、T205 中有大致呈南北向成排分布的方体木柱,从木柱外表看,F4 与 F3 不同,应是另一个木构建筑单元,其主体可能向

西南方向延伸,且西北部的一根可能是转角柱的木柱的边长超过 0.4 米,格外粗大(图四)。

Q1(独木桥?) 在 T103 第⑥层下也出土了早期木构遗迹,主体由 2 根横卧的首尾相连的粗大木材和左右两侧起支撑、加护作用的小木桩组成(图五),在其附近还出土了 2 件完整的木桨(图六、一七)和一块残桨叶。初步推断,该遗迹可能是一处临近河湖的小码头或河埠头、独木桥类设施,并且在层位上大致能与东边探方中的成片房屋建筑遗迹相联系。这一发现对于认识田螺山遗址的村落布局具有重要价值。

2. 遗物

第⑦、⑧层出土遗物的保存状况较好,我们一方面用传统方法收集肉眼可见的粗体遗物,另一方面用不同规格的筛子淘洗文化层泥土以收集微体动植物遗存,为多学科的综合研究提供材料。尽管只发掘了 T103 的第⑦、⑧层,但出土的早期遗物很丰富。按性能和材质将出土的遗物分为计件实用器物和不计件人工和自然遗物两大类。

第一类:计件实用器物。它们是当时的人们用各种材料有目的地加工和使用的单独成件的器物,按材料分为陶器、骨器(含角、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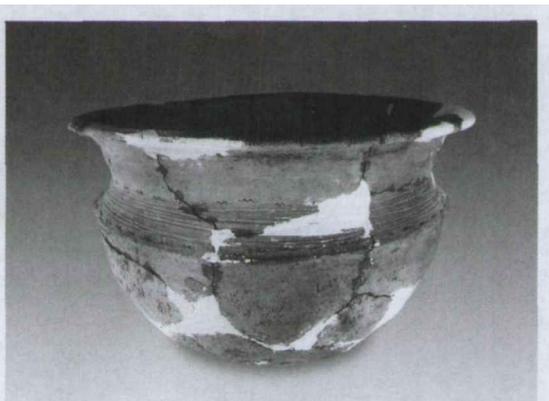
表一 陶片数量与陶系统计表 (单位:件)

地层	陶 系			陶片 总数
	夹砂	夹炭	泥质	
③A	3040	1220	1010	5270
③B	10205	2340	1785	14330
④	6975	3430	250	10655
⑤	18330	4295	0	22625
⑥	14280	3805	0	18085
⑦	5305	1790	0	7095
⑧	1365	350	0	1715
合 计	59500	17230	3045	797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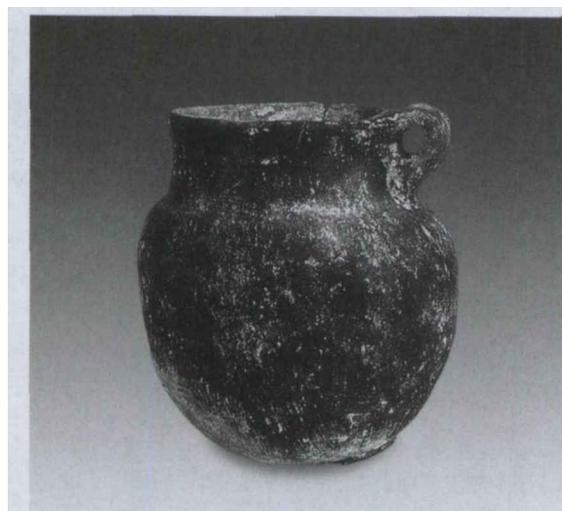
注:不含灰坑出土的陶片和已修复器物的陶片,第⑦、⑧层的陶片仅出自 T1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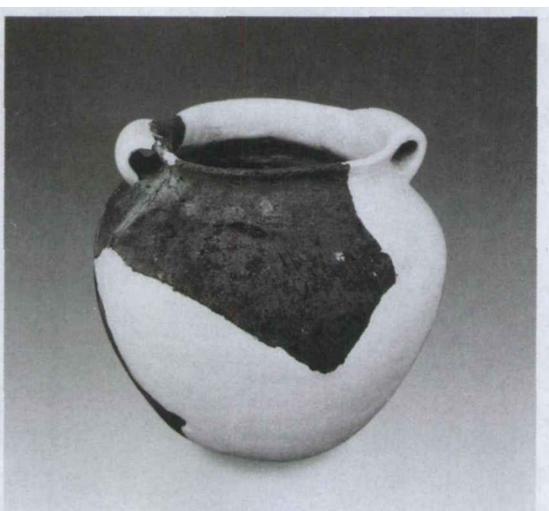
图一八 陶敛口釜(T103⑦: 39)



图一九 陶敞口釜(T103⑦: 46)



图二〇 陶单耳小口釜(T303⑥: 1)



图二一 陶罐(T103⑦: 35)

器)、石器(含用各种矿物制作的玉器)、木器、编织物(含绳索和线)。

(1) 陶器

夹砂灰黑陶最多,夹炭黑陶次之,泥质陶尚未出现(表一),这与河姆渡遗址同期的陶系构成有较大区别。陶器主要用泥条盘筑和分体拼接的方法制作,有的器物还需添加耳、把、纽、釜、流等。多数较大陶器的外表可见横向旋痕、旋纹,这与慢轮修整、器表抹光的制作工艺有关。多数陶器有装饰,常见在口沿下或肩腹转折处附加凸起的脊棱并在其上压印连续相间的锯齿纹,在腹部和圈底外表拍印或滚压绳纹,在口沿或器表刻划旋纹、短线纹、动植物图案,在口沿面、附脊、颈肩部戳印锥刺纹、蚺齿

纹、谷粒纹等。陶器中炊器的数量最多,圈底的夹砂、夹炭陶釜是该遗址的典型代表,与河姆渡遗址第④层的同类器相同。与陶釜配套使用的还有陶支脚、器座、器盖。此外,还有陶盆、盘、钵、豆、罐、盃等饮食和储藏器。陶器以圈底为主,平底次之,圈足较少,未见三足器。除陶容器外,还有陶纺轮、弹丸等小件制品。

敛口釜 口沿面和肩部多饰旋纹和谷粒纹,有的饰间断的蚺齿戳印纹,附加堆纹的凸脊上多压印锯齿纹。标本 T103⑧: 16,口径 14、高 14.8 厘米(图一一)。标本 T103⑦: 39,口径 27、高 21 厘米(图一八)。

敞口釜 装饰普遍比敛口釜简单。标本 T103⑦: 46,口径 28、高 19.3 厘米(图一九)。

直口釜 口沿微侈,口颈竖直一体,饰一圈凸脊,脊上压印锯齿纹,未复原。

单耳小口釜 形体小,单耳位于口沿外侧,略束颈,球形小腹,圜底饰绳纹。标本 T303⑥:1,口径 10.8、高 14 厘米(图二〇)。

支脚 方柱体或圆柱体,粗大,实心,未复原。

罐 均为夹炭陶。小口,矮卷沿稍外侈,微束颈,多饰旋纹,口沿至颈部外侧有双耳,双耳顶部略高于口沿面。标本 T103⑦:35,口径 14.2、高 19 厘米(图二一)。

钵 多为夹炭陶。敛口,弧腹或斜直腹,平底。标本 T103⑧:24,口径 22.4、高 9 厘米(图二二)。

盆 标本 T103⑦:6,敛口,斜腹弧凹,形制特殊,疑为制作敛口釜时用多余的部件改制而成。口径 19.6、高 10.6 厘米(图二三)。

盘 均为夹炭陶,表面较光亮。宽沿,浅腹,未复原。

豆 夹炭陶,器表呈灰黑色。厚胎,圈足粗矮,未复原。

器盖 夹炭陶。覆盆形。标本 T103⑦:40,底径 25.6、高 11 厘米(图二四)。

盃 标本 T103⑧:25,夹炭黑陶。上部呈龟背形,中脊略呈“人”字形鼓起,在刻划的近圆形轮廓线内饰谷粒形组合纹样;下部似陶罐的下腹,刻划有猪、鹿形动物和火焰形图案(图七)。

(2)骨器(含角、牙器)

骨器(含角、牙器)是该遗址出土器物中数量、种类最多的器物,是当时人们的主要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根据器形和用途的不同,选取不同种类、部位的动物骨头,用敲砸、切割、雕琢、钻凿、锉磨、刻划等方法制作而成。器类有耜、镞、哨、凿、锥、匙、针、饰件等,除耜以外,形体一般较小。骨器的纹饰较简单,多见各种细刻纹组成的几何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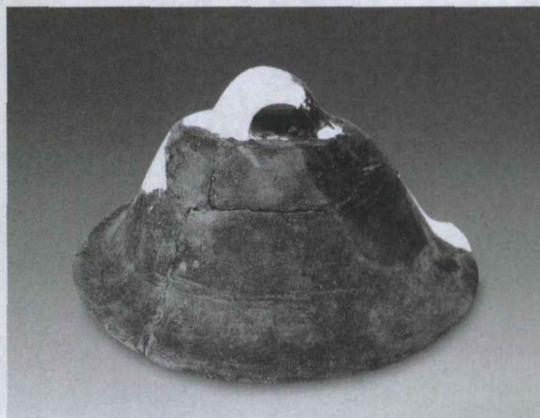
耜 2件。残,有明显的磨损痕迹。上段侧向凿扁方孔,中部穿2个小孔(图二五)。



图二二 陶钵(T103⑧:24)



图二三 陶盆(T103⑦:6)



图二四 陶器盖(T103⑦:40)

镞 100多件。形制和大小多种多样(图二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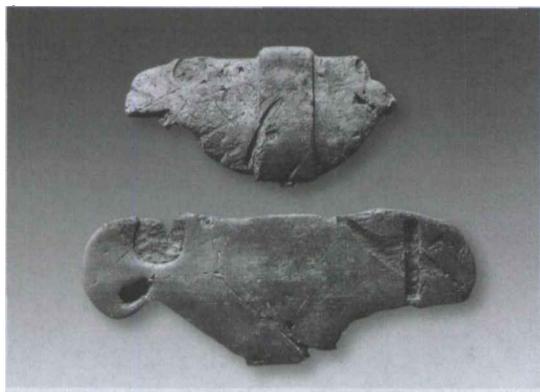
(3)石器(含用各种矿物制作的玉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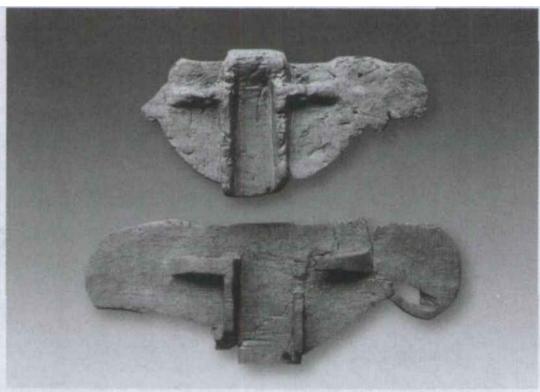
图二五 骨耜(DK37: 52)出土情况



图二六 骨镞(DK37、DK36)



图二七 木蝶形器(DK37: 55,54)正面



图二八 木蝶形器(DK37: 55,54)背面

出土的石器较少,有斧、镑、凿、砺石等,多数制作粗糙,打制出外形后在刃部略加修磨。另外,出土少量用各种矿物制作的玉器。

(4)木器

出土的木器近10件,相对骨器而言,数量和种类较少,但保存状况较好。每件木器都用整块木头制作而成,加工方法有砍、劈、镑、削、凿、雕、刻、挖、磨等。器类有桨、蝶形器、矛形

器、把手、器柄等。

桨 3件。标本 T103⑧: 3,整器磨光。小圆柄,后段略弯,尾端刻短线纹,柄与桨叶交界处变厚,饰刻纹,桨叶长而扁平,头端钝圆。长110厘米。标本 T103⑧: 4,整器有斧、镑类石器留下的劈痕,似为半成品。长柄中段近方体,尾端大,略呈长方形,柄与桨叶交界处变厚,单面呈瘤状凸起,桨叶较长,起中脊,横断面呈菱



图二九 芦苇编结物(DK3⑦: 60)

形,头端尖似矛。长 153 厘米。标本 T303⑦: 1, 整器小巧,表面大致平整。小方柄,尾端大,略呈长方形,桨叶较短,扁平,头端近平直。长 107 厘米。

蝶形器 标本 DK3⑦: 55,残宽 17.4、高 11.5 厘米(图二七:上、二八:上)。标本 DK3⑦: 54,宽 32、高 12.5 厘米(图二七:下、二八:下)。

(5) 编织物(含绳索和线)

芦苇编结物 已出土数片,有的面积较大,似席子。芦苇条劈取较匀,常用多经多纬垂直交错法编织(图二九)。

线团 标本 DK3⑦: 61,出土于一个鱼骨坑内,似用植物纤维绞成,单根粗约 0.1 厘米。

第二类:不计件人工和自然遗物。从理论上说,古代遗址中不存在与人的活动完全无关的纯自然遗物。在以往的考古发掘中通常不注意系统收集器物以外的零散遗物,如烧土块、石块、木炭等,但它们无疑都是人工遗物或受人为影响的自然遗物,只是无法单独成器。该遗址出土的这类遗物的数量和种类都很多,有古人猎食动物并取下骨器原料后废弃的动物骨头(图三〇)、人自身死亡后留下的骨骼、木柱、木块、树枝条、树叶、木屑、果核、孢粉、稻草、稻叶、谷壳、炭化米粒(图三一)、菱角(图三二)、菱壳、

橡子、酸枣、芡实、葫芦、野草、草籽、芦苇、麻栎果、豆类等。它们与当时人的生产、生活以及生存环境密切相关,是全面复原当时社会面貌、生态环境的重要材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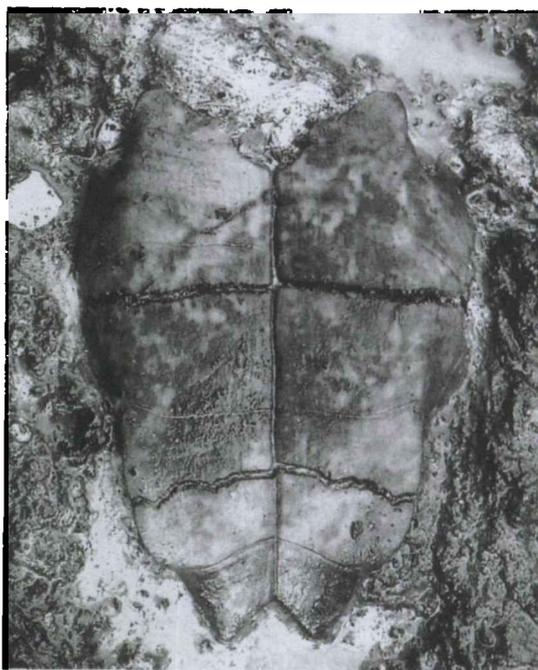
四 第二期遗存

1. 遗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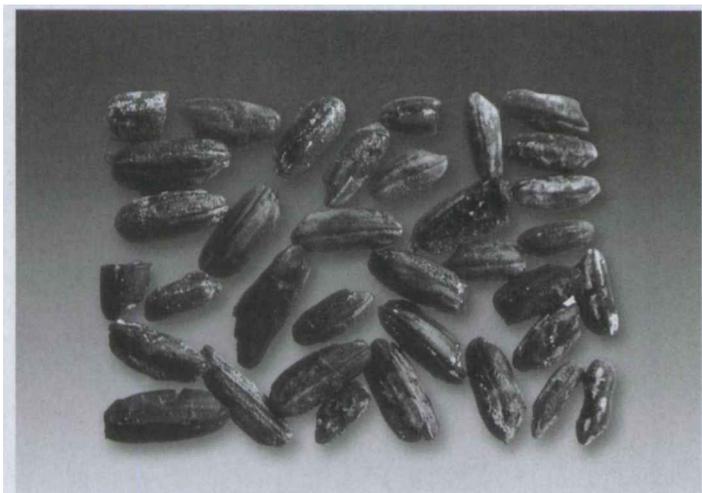
(1) 木构建筑

第⑤、⑥层的堆积由于受地下水浸润,木质遗物的保存状况较好,为我

们判断木构建筑遗迹提供了条件。在 T203 东部和 T303 西部的第④层下、第⑤层表面有 10 多个柱坑开口(图八),分布不规则,坑口多呈不整齐的方形或圆形,边长或直径、深均约 0.6 米,坑底多有一块以上厚薄不一的垫板(图三三),其中一个柱坑内错向摞叠 6 层垫板,总厚度约为 0.5 米(图九)。从柱坑的形态和垫板的加工、



图三〇 龟腹甲出土情况



图三一 T204第⑥层底部出土炭化米粒



图三二 菱角(DK37)



图三三 T303西南角第④层下柱坑

处理技术看,它们代表了史前时代以挖坑、垫板、立柱作为木构建筑基础营造技术的成熟形式。虽然在有限的发掘范围中很难看清单体建筑的平面形状、规模和走向,但这些柱坑很可能属于同一个建筑单元,暂编号为F2(图三四)。在这些柱坑的周围分布着很多大小相似的食物处理和储藏性质的灰坑。这些柱坑和灰坑所在的第⑤层堆积的表面松软且潮湿,不可能作为稳定的日常居住地面,而从个别柱坑旁仍竖立着早期木柱的情况看,这个阶段的建筑应是干栏式的木构连体长屋,而且年代可能早至河姆渡文化第二期,即距今约6500年。

(2) 墓葬

第⑤层下的遗迹较少,在T203的偏西位置发现了几座位于居住区附近的简单墓葬。这几座墓葬均没有明显的墓坑、葬具和随葬器物,多数肢骨残缺不全且散乱无序,骨骼的形态特征显示其多为青少年,它们很可能属于非正常死亡的二次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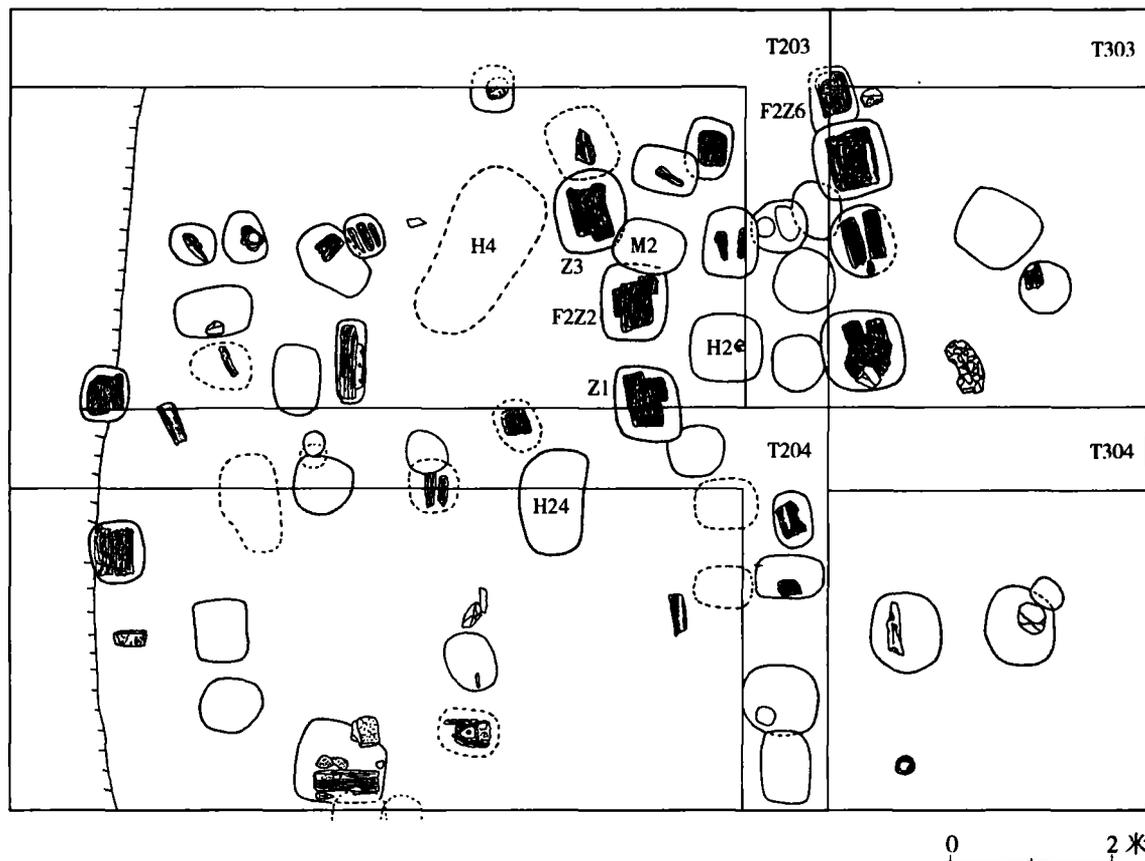
M5 骨架呈屈肢状,方向95°,骨架长70、宽50厘米(图三五)。

M6 骨架呈堆状,方向约130°(图三六)。

M9 肢骨叠放在一起,方向约60°,骨架长40、宽35厘米(图三七)。

(3) 灰坑

在第④层下有许多与柱坑一起开口的灰坑,大小和形态与柱坑相似,只是底部没有垫板,而多有较薄的淤沙层和橡子,有的有2~3件残破的陶器,它们多数可能是位于干栏式建筑居住面下方和周围的食物



图三四 T203、T303、T204、T304 第④层下柱坑、灰坑、墓葬平面分布图

储藏坑。在第⑤层下有几个灰坑的形成也与日常生活有关。

H7 开口在第⑤层下，坑口近圆形，圜底，深约 0.4 米。堆积有原生灰褐色烧土和黑色草木灰、木炭，可能是一处室外土坑式灶址（图三八）。

H9 开口在第⑤层下，坑口呈圆形，深约 0.2 米。在坑口西北部出土一堆由原料、半成品和燧石钻等 41 个个体组成的萤石和燧石制品，中部出土一件残陶釜，周围出土一些夹杂在灰白泥中的细碎鱼骨（图三九）。

2. 遗物

由于埋藏的深度略浅，第二期遗物中有机质遗物的数量和质量都不如第一期，但陶器和石器相对较多。按性能和材质将出土的遗物分为计件实用器物和不计件人工和自然遗物两大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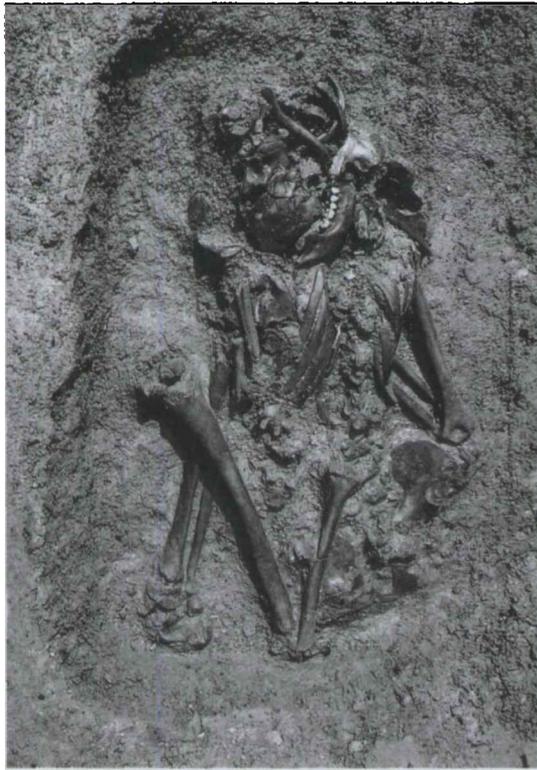
第一类：计件实用器物。按材料分为陶器、骨器（含角、牙器）、石器（含用各种矿物制作的玉器），木器和编织物基本不见。

(1) 陶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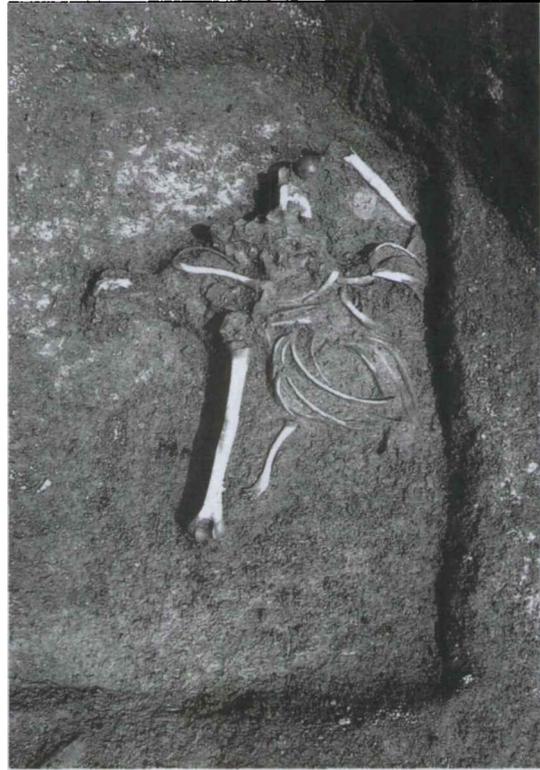
夹砂灰黑陶最多，夹炭陶次之，泥质陶基本不见。器形比第一期相对规整，凸脊减少并弱化成附加堆纹，纹饰明显简化，素面陶器增多。多见短线纹、戳印纹、旋纹、蚰齿纹，釜、罐、钵的口沿外缘多饰锯齿状花边。器类与第一期基本相同，有釜、罐、盆、盘、钵、器座、支脚、豆、纺轮、小件玩具等。

敛口釜 数量比第一期有所减少。口径显大，器高变小，形体逐渐变宽。标本 T103⑥：58，素面。口径 13.4、高 13 厘米（图四〇）。

敞口釜 数量比第一期有所增加。腹部的形态多样。标本 DK1⑤：1，筒形腹，双脊。口径 23.4、高 25.2 厘米（图一二）。



图三五 M5(由西向东摄)



图三六 M6(由西北向东南摄)



图三七 M9(由北向南摄)

直口釜 口微侈,口颈竖直一体,颈下部和中腹部饰凸脊,脊上压印锯齿状花边。标本 T205⑤: 39,口径 20.4、高 20.7 厘米(图四一)。

单耳小口釜 形体小,单耳位于口沿外侧,略束颈,球形小腹,圜底饰绳纹。标本 T303⑥: 8,口径 11.6、高 10.6 厘米(图四二)。

钵 标本 T302⑤: 50,口径 27、高 14.8 厘米(图四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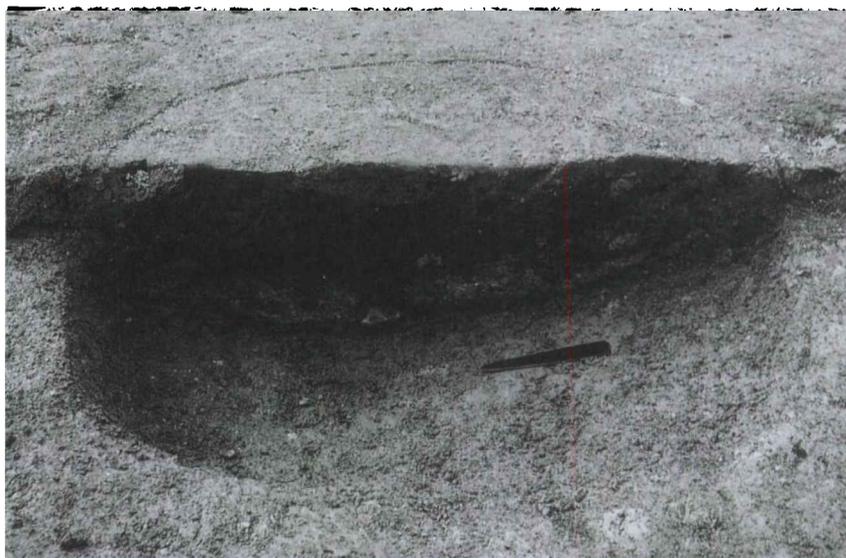
盘 标本 T103⑤: 82,平底。口径 27.2、高 5.7 厘米(图四四)。

罐 标本 M2: 1,夹炭陶。形体高大。侈口,双耳,深腹。口径 15.4、最大腹径 37、高约 92 厘米(图一〇)。标本 T205⑤: 40,口径 13.8、底径 16.4、高 36.2 厘米(图四五)。

(2)骨器(含角、牙器)

骨器(含角、牙器)仍是当时主要的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数量多于石器、木器等。主要器类、器形与第一期基本相同,有些骨器的加工技术有所进步。

图三八 H7(由南向北摄)



图三九 H9(由南向北摄)



耜 6 件。均残破或磨损严重。标本 T301⑤: 17, 用牛的髌骨制作而成(图四六)。

镞 数量较多。形制和大小多种多样。

梭形器 取鹿角的尖端作为材料, 用切割缺口、挖槽、穿孔等方法制作而成, 似为纺织用具(图四七)。

(3) 石器(含用各种矿物制作的玉器)

石器占出土器物总数的比例仍很小, 这与石器在生产、生活中很大程度上被骨器取代有关。另一方面, 当时在砍伐和加工木材、营建木

结构房屋以及加工骨器的过程中, 石器具有优势, 骨器无法取而代之。器类有镞、斧、凿、楔等。石材除了用较硬的青灰色硅质岩外, 也开始用硬度适中的泥岩。有的石器经过磨光, 且器形规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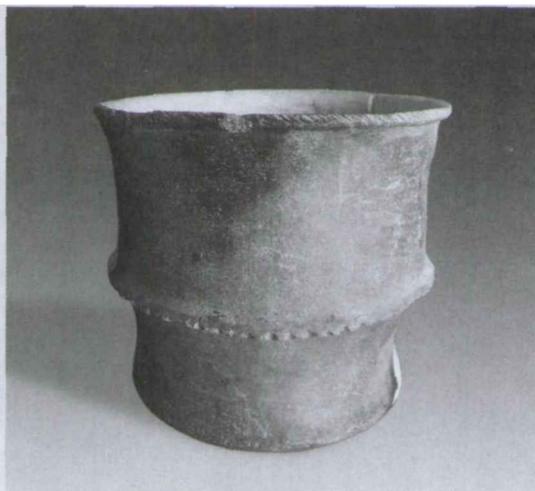
镞 与斧在形制上没有明显分化, 难以区分, 唯两面起刃不对称, 厚度略薄(图四八)。

斧 多呈长方形, 器身中段较厚, 略显转折, 双面刃略偏锋, 刃宽多为 4~5 厘米(图四九)。

凿 长条形, 较厚实, 对称双面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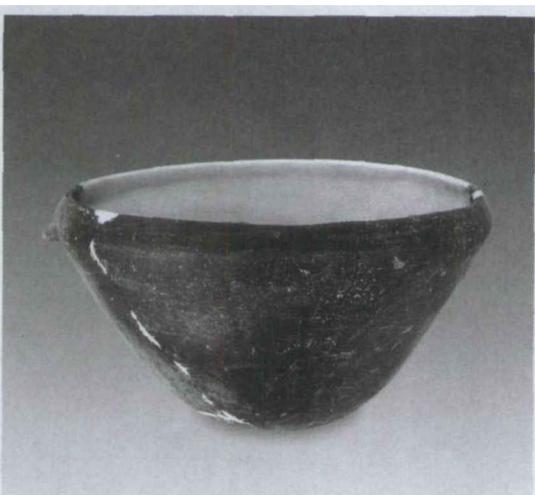
图四〇 陶敛口釜(T103⑥: 58)



图四一 陶直口釜(T205⑤: 3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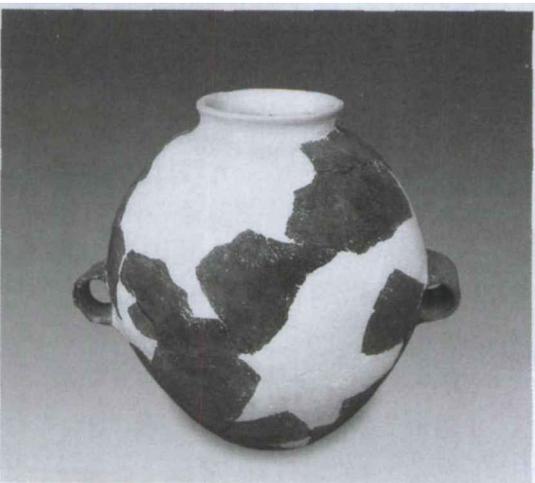
图四二 陶单耳小口釜(T303⑥: 8)



图四三 陶钵(T302⑤: 50)



图四四 陶盘(T103⑤: 82)



图四五 陶罐(T205⑤: 40)



图四六 骨耜(T301⑤:17)

楔形制似斧,但一般比斧窄长。整体较厚,顶端多有麻点状的击打痕,可能是一种剖裂长木材的工具。

球 多用硬度较大的燧石、石英、硅质岩制作而成,表面粗糙,多麻点。直径多为 3~5 厘米。

砺石 材料为砂岩。主要用于加工骨器和石器,有的磨面平缓,有的残留因磨制条形骨器而形成的条形浅槽。

饰件 一般用石英、萤石、叶蜡石等制作而成。器类有块、璜、管、珠、坠等,无纹饰。

第二类:不计件人工和自然遗物。由于文化堆积埋藏的深度仅 1 米多,地下水不能长期稳定在这个深度,有机质遗物的保存状况较差。除了柱坑底部的垫板和动物遗存外,木屑、果核、种子、草叶等只残留在较深的灰坑和柱坑底部(图五〇)。

五 第三期遗存

1. 遗迹

第三期的遗迹较少且零散,只有一片较密集的石块、红烧土块分布区和少量的灰坑、柱坑、墓葬。

(1) 建筑残迹

在第②A层下、第③A层表面有近南北向密集排列的石块,可能与遗址晚期的建筑有关,也可能是村落居住区的边界。

在第③A层下有 9 个不规则分布的柱坑,其中 2 个柱坑近方形,边长约 0.6、残深 0.15 米,坑底有条状垫木,其余 7 个柱坑底部均有单块垫板(图五一)。它们与第二期的柱坑有明显的传承性,应是一种建筑遗迹,暂编号为 F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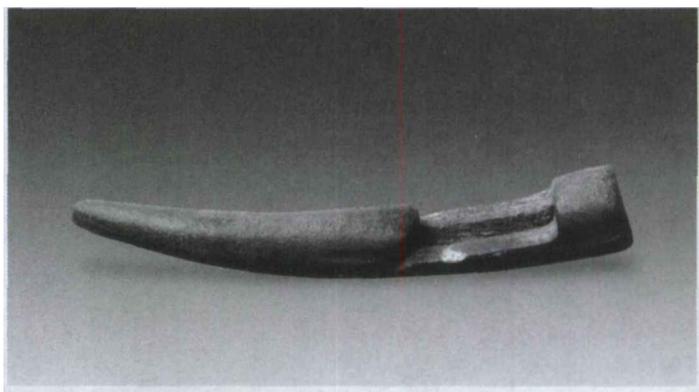
(2) 墓葬

M3 在 T304 东北角第②A层下开口。坑口近圆形,圜底,直径约 0.8、残深约 0.3 米。出土 3 件陶器,其中 2 件是上下叠压的夹炭红褐陶盘口釜,在河姆渡遗址附近的鲞架山遗址中也出土过类似的陶釜,当时推测是一种比较特殊的瓮罐葬(图五三)。

M4 在 T304 北部第③A层下开口,坑口被一个柱坑打破。残长 0.85、宽约 0.65、深约 0.2 米。出土一具骨架,方向 90°,肢骨集中堆放,未见葬具和随葬器物,应为二次葬(图五二)。

(3) 灰坑

H1 在 T303 东北部第②A层下开口。坑口为圆角长方形,坑壁略呈袋状,长 1.05、宽 0.85、深约 0.65 米。坑底有较多的红烧土块和草木灰,出土 1 件夹砂红褐陶筒腹釜和许多陶釜、



图四七 骨梭形器(DK3⑥:37)



图四八 石斧(T301⑤:11)



图四九 石斧(T301⑤:5)

盘的碎片。H1可能是一处土坑式灶址(图五四)。

H22 在T204东北角第③A层下开口。坑口为圆角长方形,坑壁近直,圆底,长0.8、宽0.6、深0.85米。坑底有许多橡子(图五五)。

2. 遗物

第③A、④层出土的有机质遗物较少,主要是灰褐色泥质陶、红褐色夹砂陶、烧土块、石块、残石器 etc 遗物,仅在T103第③B层出土了一些骨器和木头。另外,在个别较深的灰坑底部出土了一些木头、橡子、草叶等有机质遗物。按性能和材质将出土的遗物分为计件实用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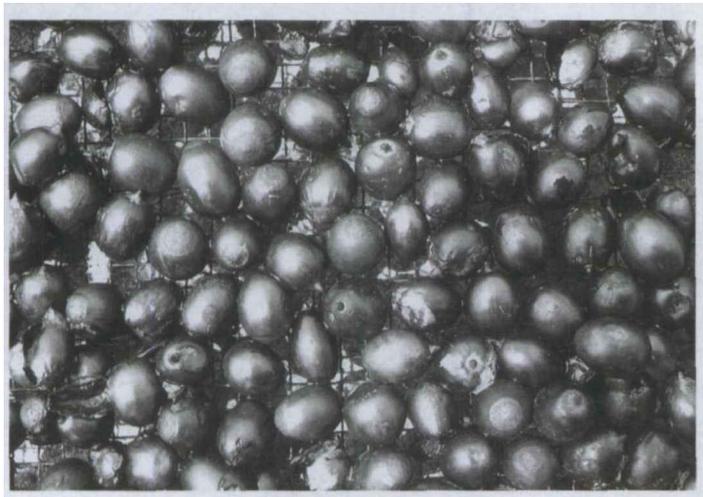
物和不计件人工和自然遗物两大类。

第一类:计件实用器物。按材料分为陶器、骨器(含角、牙器)、石器(含用各种矿物制作的玉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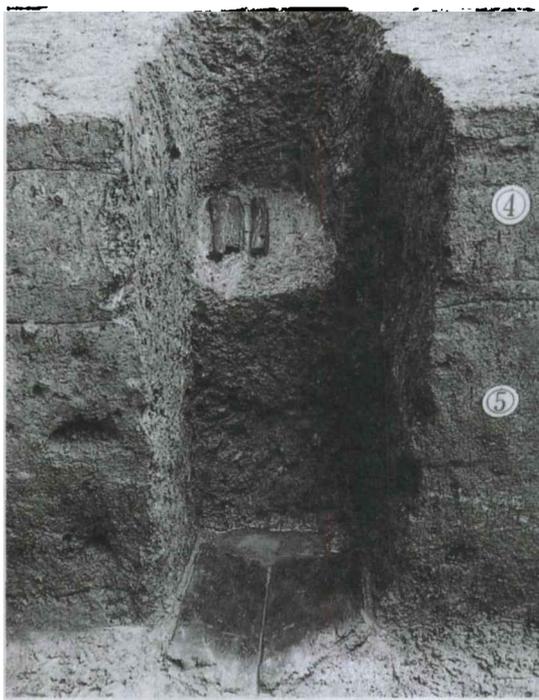
(1)陶器

夹砂陶、泥质陶和夹炭陶的比例相当,其中夹炭陶的质地疏松,多有红衣,并多饰繁复的附加堆纹;夹砂陶以夹砂灰陶为主,含砂粒较粗,胎质多硬实;泥质陶有红、黑两种,前者多是外壁红、内壁黑,后者一般是泥质灰胎黑皮陶。器表装饰已明显简化,以素面为主,部分器物上有绳纹、短线纹、锯齿纹、戳印纹、附加堆纹等。陶釜中的敞口釜仍为主流炊器,但形制、装饰风格、制作工艺与前期相比有较大的区别,新出现了以不规整柱状足为特征的鼎、多角沿釜等炊器,另有罐、支脚、灶、陶塑等。

敞口釜 夹细砂灰黑陶。形体较大。敞口,粗颈,垂腹,圆底近平。沿下饰附加堆纹,腹部和底部饰绳纹。标本H4:2,口径32.6、高24.4厘米(图一三)。另有一种形体较小者。敞口,浅筒形腹。饰绳



图五〇 H5出土橡子



图五一 第三期柱坑



图五二 M4(由西向东摄)

纹。标本 T203④：4，口径 31.6、高 22.6 厘米（图五六）。

盘口釜 标本 M3：3，夹炭黑陶，器表红褐衣已脱落。盘口，束颈，宽肩，圜底。肩部饰附加堆纹和蚶壳印纹，腹部饰细绳纹。口径 24、最大腹径 38、高 43 厘米（图一四）。

鼎 夹粗砂陶。宽沿，沿面大多内凹，以柱状足为主，未复原。

罐 形体多矮胖。有牛鼻形双耳，未复原。

支脚 标本 T303③A：1，夹砂红褐陶。下部为中空喇叭形，上部捏塑成动物头形，肩部有一半环形耳，其下方用戳孔加刻划的方法饰人面形。底径 18、高 20 厘米（图一五）。

灶 残。表面有指甲剔刻纹，有的有拱形投柴孔，未复原。

陶塑 多以动植物为原形制作而成，有的单独成件，有的是陶器的纽、耳、流等部件。标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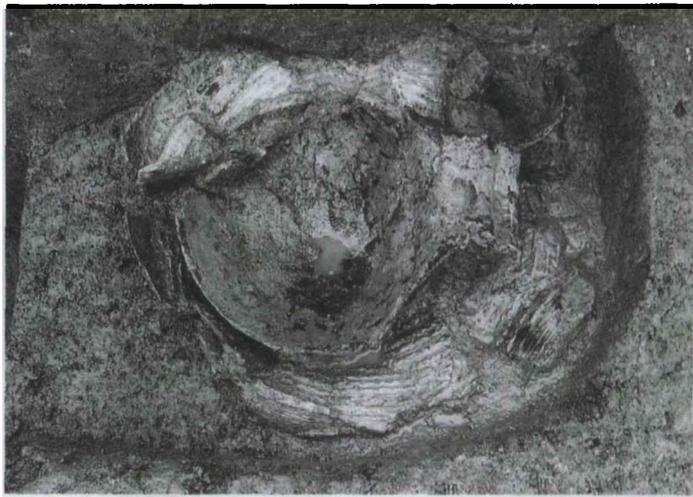
T204③A：2，象头形陶塑。夹砂红陶（图五七）。

(2)骨器(含角、牙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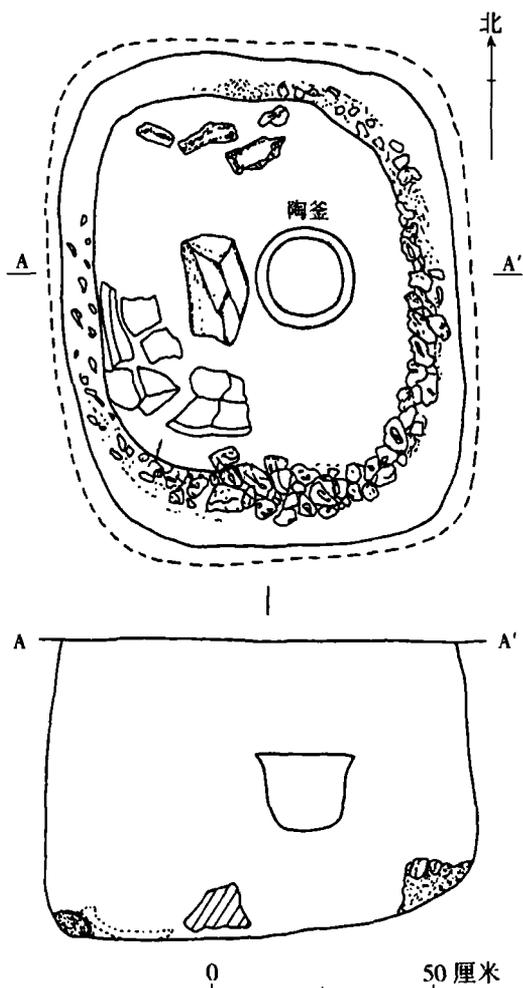
骨器(含角、牙器)很少，有耜、坠饰等。

耜 标本 T203③B：1，形制与第二期基本一致。中部有明显的用于安柄的凹痕（图五八）。

坠饰 标本 T203④：1，用鹿类动物的角略加修磨和钻孔制作而成（图五九）。



图五三 M3(由西向东摄)



图五四 H1平、剖面图

(3) 石器(含用各种矿物制作的玉器)

石器在选料、工艺方面与第二期相比有明显的改进,高硬度的石料基本被淘汰,多选用沉积岩等硬度适中的岩石,但锋利程度有所提高。石器大多形体规整,磨制光洁,有斧、镑、凿、砺石、球、弹丸等。用各种矿物制作的玉器多采用线锯切割和片锯切割工艺,有玦(图一六)、管、璜、珠、坠等,其中玦、管、珠等还采用实心钻或点式旋钻工艺。

第二类:不计件人工和自然遗物。除个别较深的灰坑底部有木头、草叶等外,还有红烧土块和石块,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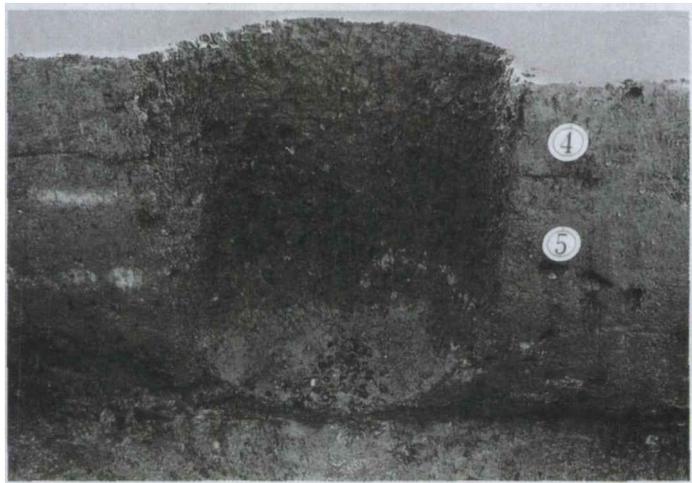
量较多。它们对于认识该遗址晚期的聚落形态有一定的价值。

六 结 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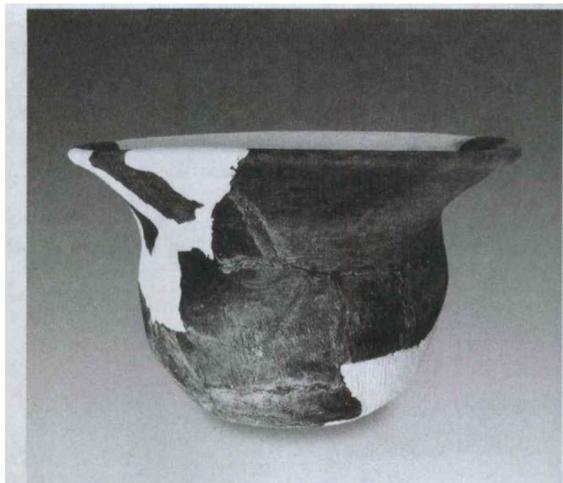
近年来,在宁绍地区西部、南部和金衢盆地边缘的浦江小盆地,相继发现和发掘了跨湖桥^[2]、上山^[3]、小黄山^[4]等重要遗址,出土了约距今10000~7000年的新石器时代较早期遗存,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大反响。虽然它们均未能表现出与河姆渡文化的直接联系,但在一个空间不大的地理区域找到了诸多早于河姆渡文化的遗存,明确显示出钱塘江和杭州湾南岸早期史前文化格局的复杂性,也更加凸显出探索河姆渡文化源头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对于田螺山遗址的发掘来说,河姆渡遗址既是一个考古发现的界标,更是史前文化学术研究难以超越的一个顶峰,但田螺山遗址2004年的发掘还是显现出非同寻常的意义。

第一,在300平方米的发掘范围里,在大部分尚未发掘到底的情况下,已出土各类器物1000多件。而在河姆渡遗址2600多平方米的发掘范围里出土6000多件遗物和不计其数的动植物遗存,虽为复原远古社会的生产、生活场景与生态环境提供了丰富的材料,但由于晚期遗存较单薄、早晚期文化的差异,至今仍有关于河姆渡遗址早晚期遗存的文化属性等问题



图五五 H22(由西向东摄)



图五六 陶敞口釜(T203④: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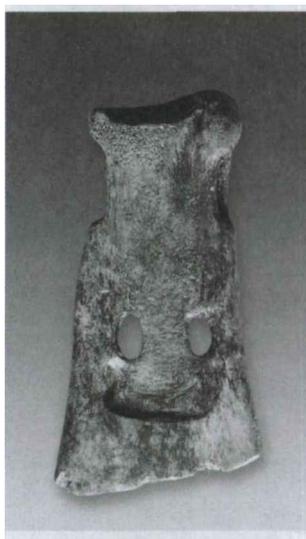
图五七 象头形陶塑(T204③A: 2)

的争议。田螺山遗址清晰和连续的地层关系以及第一~三期遗存中紧密衔接的文化内涵,特别是第三期以大量陶敞口釜为代表的核心因素,可以有力地平息上述争议。

第二,在河姆渡遗址发掘之后直至 1996 年 钵山遗址^[5]的发掘,其间没有发现其他河姆渡文化早期遗存。2004 年田螺山遗址的发掘实现了河姆渡文化早期遗址在姚江流域的空间分布“由点成线,再到面”的历史跨越,由此促使我们提出“河姆渡文化核心聚落群”的概念。发掘和钻探情况还表明,田螺山遗址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河姆渡文化中地面环境条件最好、地下遗存比较完整的一处依山傍水式的古村落遗址,在地理位置上与河姆渡遗址遥相呼应,并具有与河姆渡遗址相近的聚落规模和至少相似的年代跨度,对于研究河姆渡文化具有独特价值。

第三,在田螺山遗址普遍发现了叠压在文化层上、下的淤泥层——全新世海相沉积,它表明了河姆渡文化在沿海地区形成和发展的特殊性,也为发掘区内东、西两部分早晚堆积的明显落差找到了距今 6000 年前后海平面快速上升、自然和人文环境突变的一个证据,并为解释河姆渡文化早晚期遗存面貌的较大差异找到了重要

的切入点。我们结合萧山跨湖桥遗址类似的地层关系和¹⁴C 数据,可以分析和修正对河姆渡文化已有的年代判断。跨湖桥遗址的多个¹⁴C 数据显示其文化遗存在距今 7000 年以前,但这些数据和河姆渡遗址原有¹⁴C 数据发生了矛盾,即导致跨湖桥文化消失或毁灭的海平面上升过程却与河姆渡文化在沿海地区出现和繁盛的过程同步。据古地理学等相关研究成果看,全新世海平面上升虽然是波动式的,但在宁绍地区这样一个小区域里应该是同步的,所以跨湖桥遗址和田螺山遗址的年代上限应该基本一致。据田螺山样品¹⁴C 数据,第⑧层标本的 2 个校正数



图五八 骨耜(T203③B: 1)



图五九 角坠饰(T203④: 1)

表二

 ^{14}C 年代测定表

实验室编号	原编号	标本物质	^{14}C 年代(BP)	校正年代(BC)68.2%
BK2004027	04YTT103⑧	木炭	6711 ± 90 年	5720 ~ 5530 年
BK2004028	04YTT104③B	木炭	5081 ± 66 年	3960 ~ 3790 年
BK2004029	04YTT204⑤	木炭	6362 ± 117 年	5480 ~ 5230 年
BK2004030	04YTT304⑧	木炭	6949 ± 73 年	5890 ~ 5730 年

注:BP为距1950年的 ^{14}C 年代, ^{14}C 年代计算所用半衰期为5568年。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科技考古与文物保护实验室2005年3月测定。

据均在距今8000~7500年之间(表二),这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河姆渡文化早期与跨湖桥文化平行发展的新认识。

第四,经过发掘和钻探已初步了解了遗址的范围和布局,特别是在有限的发掘区内,发现了第⑥层下两种性质的聚落遗迹——干栏式建筑和村落西侧通向外界的水岸木构设施,二者分处不同的空间位置,在使用功能上又有直接的联系。这为认识田螺山遗址的村落布局和进一步开展河姆渡文化聚落考古研究提供了重要材料。

第五,发掘出土的多层次柱坑遗迹,一方面有序地代表了以挖坑、垫板、立柱为建筑基础营建技术的阶段性特征和发展水平,另一方面间接地反映出河姆渡先民的生存活动与自然环境演变的密切关系。同时,由于这些遗迹的开口层位在发掘中得到可靠认定,因此可以证实此类建筑技术的起始年代应该至少在河姆渡文化第二期,即距今6500年前后,并进一步表明南方地区史前木构建筑中,围护与承重功能分离的技术进步对后世建筑结构和形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另外,已初步揭露的第⑥层下以成排方体木柱为主要形式的早期木构建筑遗迹的干栏式属性比较明确,建筑技术更加成熟,为复原建筑单元创造了良好的开端。

第六,在以往的考古发掘中通常会把纯净的淤泥层看做生土层。在田螺山遗址距地表5米多深的淤泥层下的地下山坡表面发现了一些微粒木炭,另外在DK3(施工坑)一角的地质钻探中,在近10米深处发现了一些木炭和可能是小陶块的颗粒,这为我们在姚江流域寻找距

今七八千年以前的古人生活遗存、揭开河姆渡文化起源之谜提供了线索。

第七,田螺山遗址得天独厚的埋藏环境和丰富的遗存,为我们开展多学科研究、把握当时社会经济形态的复杂性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30多年来,河姆渡文化一直是宁绍地区史前考古的核心内容,田螺山遗址2004年的发掘对于河姆渡文化的深入研究、保护和宣传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领 队:孙国平

发 掘:孙国平 黄渭金 郑云飞

刘志远 徐志清 渠开营

张海真

整 理:孙国平 徐志清 渠开营

张海真

摄 影:孙国平 李永嘉 郑云飞

绘 图:刘志远 孙国平 许慈波

执 笔:孙国平 黄渭金

[1] 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河姆渡遗址第一期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8年第1期;河姆渡遗址考古队《浙江河姆渡遗址第二期发掘的主要收获》,《文物》1980年第5期;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姆渡——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3年。

[2]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萧山跨湖桥新石器时代遗址》,《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1996年,总第3期;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跨湖桥》,文物出版社,2004年。

(下转第73页)

- 籍出版社,2007年。以下凡引朱玉麒云云,均出此文,不再注明。
- [3] 均见何晏、皇侃《论语集解义疏》,丛书集成初编本,第280页,商务印书馆,1937年。
- [4] 前揭何晏、皇侃《论语集解义疏》,第1~2页。
- [5] 陆德明《经典释文》,第355页,中华书局,1983年。
- [6] 王国维《书论语郑氏注残卷后》,《观堂集林》卷四,第172页,中华书局重印本,1984年。
- [7] 参阅武内义雄《论语之研究》“《尧曰》篇补正及其内容”与“关于《子张问》篇”二节,第185~198、225~230页,东京:岩波书店,1939年。
- [8] 王素《唐写本〈论语郑氏注〉校读札记》,《唐写本论语郑氏注及其研究》,第244页,文物出版社,1991年。
- [9] 此六例均引自前揭王素《唐写本论语郑氏注及其研究》,每例最后的括注,为《郑注》篇名与本书页码。
- [10] 前揭荣新江、李肖、孟宪实《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概说》,第45页。
- [11] 前揭王素《唐写本〈论语郑氏注〉校读札记》,第246~248页。
- [12] 王素《高昌史稿·交通编》,第369~373页,文物出版社,2000年。
- (责任编辑:张小舟)

(上接第24页)

- [3]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2001年、2004年、2005年发掘资料。
- [4] 张恒等《浙江嵊州小黄山遗址发现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中国文物报》2005年9月30日。
- [5]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浙江余姚市崧山遗址发掘简报》,《考古》2001年第10期。
- (责任编辑:王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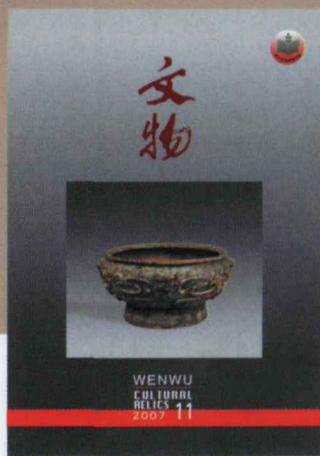
Brief Report of the Excavation on a Neolithic Site at Tianluoshan Hill in Yuyao City, Zhejiang

Zhejiang Provincial Institute of Cultural Relics and Archaeology
Yuyao Municipal Office of the Preservation of Cultural Relics
Hemudu Site Museum

Excavated between February and July, 2004, the Tianluoshan Site is located at the Xiang'ao Village of Sanqishi Town, Yuyao City, Zhejiang Province. It lies to the north of the Yao River valley, in the middle of a small basin surrounded by low mounts, and to its southwest, the Hemudu Site is about seven kilometers away. The Tianluoshan Site dates back to six or seven thousand years. The excavation area is 300 square metres, including building and grave remains. The unearthed objects include wood and bone objects, stonewares, potteries, jade ornaments, basketworks and some crops. It is revealed by drilling and excavation that this site is an ancient village at the foot of a mountain and by a river. It is to date, among the known sites of Hemudu culture, the best preserved in terms of aboveground environment and underground remains. It has similar physical scale and temporal span as the Hemudu Site and is extremely valuable to the study of the origins of the Hemudu culture.

文物

CULTURAL RELICS 总第六一八期 2007.11



浙江余姚田螺山新石器时代遗址 2004 年发掘简报

田螺山遗址位于浙江省余姚市三七市镇相岙村,地处姚江谷地北侧低丘环绕的小盆地中部,西南距河姆渡遗址约 7 公里。2004 年 2~7 月,由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河姆渡遗址博物馆联合对该遗址进行了发掘,发掘面积为 300 平方米。根据土色、土质、地层叠压关系和出土器物的形制,将该遗址分为早晚紧密衔接且文化内涵各具特色的三个阶段。发掘和钻探情况表明,该遗址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河姆渡文化中地面环境条件最好、地下遗存比较完整的一处依山傍水式的古村落遗址,具有与河姆渡遗址相近的聚落规模和至少相似的年代跨度,对于研究河姆渡文化具有重要价值。

浙江瓯海杨府山西周土墩墓发掘简报

2003 年 9 月,考古工作者在浙江省温州市瓯海区抢救性发掘一座西周时期墓葬。随葬品有鼎、簋、铙等青铜礼乐器和戈、矛、短剑、镞等铜兵器。同时出土的还有玦、镯、柄形器、蝉形饰、管形饰等玉器,以及绿松石饰品。该墓是在略加平整的山顶上直接堆土掩埋,为一座典型的土墩墓,墓主是西周中期越族的贵族。

中国早期镶嵌瓷的考察

10~11 世纪的中国瓷器有两种剔划装饰,一是剔划填彩,二是剔划嵌粉。本文通过实物资料说明这两种装饰均起源于中晚唐时期,前者源自唐代黄堡窑的剔划填白彩,后者源自唐代巩县窑和越窑的绞胎复合镶嵌。从目前的资料看,这两种装饰在 10~11 世纪主要流行于河南中部一带,是晚唐至北宋初期瓷器装饰追求变化的表现。剔划填彩变化多样,构成一个独立的装饰系统,延续至元代;剔划嵌粉工艺复杂,在中国影响到少数地区,但却成为高丽象嵌工艺的源头。